

中国考古学会

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

2013

文物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会
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

2013

中国考古学会编辑
文物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 / 中国考古学会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010 - 4536 - 5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考古学 - 中国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K87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9113 号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 2013

编 者: 中国考古学会

责任编辑: 蔡 敏 陈春婷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张 丽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5 插页: 1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4536 - 5

定 价: 198.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宿 白

主 任：张忠培

副 主 任：王 巍 童明康 赵 辉

编 委：王 巍 乔 梁 孙新民 李 季 李水城

李伯谦 张忠培 陈 雍 陈星灿 赵 辉

郭大顺 徐光冀 袁家荣 曹锦炎 童明康

董 琦 焦南峰

主 编：王 巍

副 主 编：陈星灿

执行主编：庞小霞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暨 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词

(代序)

张忠培

(2013年10月24日 陕西西安)

中国考古学会召开的本次会议，内容有两项：一是“全球视野下的古代中国——以周秦汉唐为中心”主题的学术研讨；二是召开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产生第六届理事会，实现理事会新陈代谢。我就这两项内容讲点个人意见与认识。

一 关于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

我要向同仁们报告的是，2008年，我受宿白先生的嘱咐，经第五届理事会选举成为学会理事长的时刻，就深知本届理事会面临这样四项任务：一是恢复考古学会正常秩序，进而将中国考古学会办成自由、民主、平等与开放的“中国考古学自由人的联合体”；二是维护 and 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体制，以推进包括考古学遗存在内的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三是高举苏秉琦创立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的旗帜，遵循他倡导的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说和文明论的基本观点，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的务实求真的学风，实现学术创新，促进中国考古学的持续发展；四是顺势按时地完成换届选举，产生不包括我在内的新一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今天，距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暨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的2008年10月22日，已是整整五年零一天，还不算晚，应该说是“按时”。在这两届会员代表大会更替的此时此刻，回顾本届理事会以往的工作，我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和第五届会员代表的关注之下，通过本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同仁共同努力，已基本完成了上述四项任务中的一、二、三项任务，第四项任务，则需今次召开的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来完成。对此，我持乐观态度，并充满信心，认为参加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全体会员代表定将秉持会章，团结奋进，完成这一任务。

同时，我还想就自己的心愿作进一步说明：自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以来的34年中，我被历届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选举，已先后担任了34年理事、19年

常务理事、9年副理事长和5年理事长，服务于中国考古学会。我担任理事的年头，比起任过理事的任何一位同仁或先辈的时间都长，最后担任理事、常务理事和理事长的五年，已是超龄服役。现在年岁更长，深感难以再为中国考古学会服务了，特在此向在座的各位表达我这个心愿，讲明白一些，就是在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不参与理事的选举，并从此放弃参与常务理事、秘书长、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的选举，自此以后，只做一位遵照会章，履行应尽的各项义务的中国考古学会终身会员。中国考古学会是光荣的，我对仅做一位中国考古学会的会员，感到万分荣幸！且以实现这一愿望，作为自己对本次会议的另一追求。

二 关于第十六次年会的主题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所研讨的学术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古代中国——以周秦汉唐为中心”。就这个学术主题来说，我觉得有如下几层意思：一是虽以周秦汉唐为中心进行讨论、研究，同时，也如以往一样，本次学术年会也欢迎周秦汉唐以外的论著，加入讨论；二是所以“以周秦汉唐为中心”，目的实是拟通过讨论，明确周秦汉唐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以阐明其历史价值。而要达到这一追求，研究者则需以周，或秦，或汉，或唐为本体，将其同其他时期的古代中国进行历史的比较，加以研究，才能历史地确定周秦汉唐的历史定位，进而才能看清楚这些王（皇）朝各自在中国历史中所做出的贡献，认定其历史价值。这自然就要涉及周秦汉唐以外的古代中国；三是“以周秦汉唐为中心”，是对“全球视野下的古代中国”中的“古代中国”的界说，故“全球视野下的古代中国”中的“古代中国”的基本指向，是周秦汉唐。“全球视野下的周秦汉唐”中的“全球”，指的是周秦汉唐当时的全球人文环境，所谓“全球视野”，是要求我们从周秦汉唐当时的全球人文环境出发，历史地观察周秦汉唐，并同周、秦、汉、唐共时的文明国家各自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周秦汉唐各自的历史位置，阐明其各自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周秦汉唐在其同时的全球文明中的位置与价值，做出恰如其分的客观评估。

主张并践行考古学是广义史学的一翼，是我们的学术宗旨。本届理事会所倡议和推行的学术活动，既是以这一学术宗旨为出发点，也是以这一学术宗旨为追求的目标。比较本届理事会以往举办的历次年会设定的学术主题，本次年会设定的学术主题的追求、视野扩大了，层次有所深化，水平提高了。所以如此，目的是提升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水平，使之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乃至发言权。这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深知，这是无止境的长征，当前期望的自然不是实现这一愿景，而是朝这一愿景迈开第一步。

三 渭河流域在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

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所以将这次会议安排在西安召开，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西安是中国考古学会的诞生地。现今距中国考古学人于1979年在西安成立中国考古学会已过去了34年，中国考古学会开始迈入了中年，今次回到故乡聚会，目的之一是看望家乡的父老乡亲，并请父老乡亲检阅我们，评估我们长成了什么模样！

二是因为西安及其所处的渭河流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渭河流域孕育成长起来了一支长达四千年之久的半坡—西阴谱系文化。在中国与这支谱系文化共时的诸谱系考古学文化中，半坡—西阴这支谱系文化的发展水平，在相当长的历史内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并对其他诸谱系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同时，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王（皇）朝周秦汉唐，也与渭河流域存在着至为密切的关系。渭河是周、秦的发祥地，居于渭河沿岸的西安与咸阳，分别是西周、西汉及唐皇朝和秦的都城。中国考古学会本次年会设定的“全球视野下的古代中国——以周秦汉唐为中心”这一学术主题，与其说是因为要到西安开这次会才设置这一主题，还不如说是因为设立了这一学术主题，才择定于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我们所以以这一学术主题择定于西安召开本次年会，除了想使这一学术主题得到较为深入讨论与研究之外，也想为参与会议的人员提供一次朝觐这一文明圣地的机会。

坐落于渭河流域的西安，是我走上考古学道路的起步的地方，渭河流域是我从事考古的故乡。借这次会议的机会，讲讲我学习渭河流域考古的一些收获，和朋友们交流。限于时间，在此只能作提要的说明。

（一）渭河流域孕育的远古文化和最初的文明，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主根，是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满天星斗中的一颗亮星

中华远古的考古学文化所表述的文化，就其文化谱系来说，都是多元的。从其居于主流地位的几支谱系的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分布来看，可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拉木伦河流域视为中华文化的摇篮。如果进而仔细观察，我们就发现不是这些大河、大江的整个流域，也不是这些大河、大江的本体，而是注入这些大江、大河的某一支流，才是某支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地区。因此，这些大江、大河流域的某些支流，才处于中华文化摇篮的核心位置。可见这些大河、大江不是我们习称的中华文化的母亲河，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母亲河，是流入这些大河、大江的某一两条支流。

渭河是黄河流域众多支流中最大的一条支流。她孕育了半坡—西阴文化这一谱系

的考古学文化。从至今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来看，这一谱系文化，植根于老官台文化，一脉承传，约至龙山时代，其主体发展成客省庄文化，经历约四千多年。渭河流域成长起来的这支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同与其共时的分布于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和西拉木伦河流域诸支谱系的考古学文化相比，是一支最为强势的文化，对其他诸支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促进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下面，我简要地讲讲我提出的这一认识：

其一，半坡—西阴文化这支谱系考古学文化，发展到西阴文化时期，将与其同时的其他诸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抛在后面，其居民急剧地向四方迁徙扩张，向西扩至青海的湟水，南方驻进了湖北和四川，北抵阴山脚下，东达华北平原。同时，与西阴文化共时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下游和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薛家岗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刘林期大汶口文化和西阴期红山文化无不受其影响，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吸收了他们爱好的或认为是先进的西阴文化的文化因素，融入到自身文化，将自己的文化演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是西阴文化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腹地的这些考古学文化的进步作用，才打破了原先诸考古学文化的均衡态势，呈现出诸考古学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大吸收和大融合的勃勃生机，出现了诸考古学文化大重组的新格局，从而使此时期的史前中国腹地的诸考古学文化居民普遍地迈入了父系氏族制社会阶段，乃至在其晚期包括他自身在内的一些考古学文化居民还踏进了“英雄时代”的门槛。自此，史前中国跃进到了经济大进步、社会组织及社会制度大变革、思想大革新和文化大繁荣的空前盛世。如果将这一时代与后世中国相比，其社会震荡与变革之纵深程度，可比之如战国时代，而就其中的西阴文化在当时中国诸考古学文化中所处的发展态势来看，则西阴文化可同二里冈时期的商文化相匹配。

其二，这支谱系考古学文化至西阴文化之后，分化成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些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一定时期的发展，至龙山时代，分别形成杏花文化、三里桥文化、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和马厂文化等考古学文化。至夏代，这些龙山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或其后裔，又演化成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另外，夏、商文化溯源，虽至今难解，但考虑到这两种考古学文化均形成和发达于半坡—西阴谱系考古学文化分布地域之内，故个人据此斗胆猜测西阴文化很可能是形成夏、商文化的最早源头。同时，这支谱系考古学文化中的西阴文化，特别是由它衍生出来的马家窑文化的居民迁徙于四川和西藏，则为开发或提升广大的西南地区的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了汉藏语系藏、彝、羌语藏缅语族的族源，或是其重要族源之一。此外，马家窑文化后裔马厂文化居民，移民到了新疆的哈密地区，则开创了黄河流域和西域居民经济与文化的直面交流。此等文化与经济交流，除向西域居民输出黄河流域经济与文化成就外，至迟到达马厂文化后裔四坝文化之时，黄河流域居民从西域居民那里传入了种植大麦、小麦和驯马的技术。可以认为，马厂文化居民是凿通西域的最早的黄河流域的使者。

其三，这一谱系考古学文化，演进到半坡四期文化之时，与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和西拉木伦河的其他诸同时的考古学文化一起，步入了文明的门槛。至此，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满天星斗中，渭河流域孕育的最初文明，是这满天星斗中的一颗亮星。不过，各地考古学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文明特征，或有些区别。半坡四期文化的文明特征，是军权同崇祖敬天信仰相结合，至迟到后来的客省庄文化早期，则还加上卜骨宗教。说起卜骨宗教，据迄今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可知其发源地乃是渭河流域。卜骨宗教在半坡—西阴这一谱系考古学文化生根之后，便向外传播，至龙山时代，便成为除马厂文化分布区之外的黄河、淮河和汉水诸考古学文化的一致信仰。到自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后的三代，卜骨宗教的流行区域进一步扩大，而成为包括西拉木伦河和长江在内的我国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卜骨信仰的传播，对中国诸考古学文化居民的思想与文化的共性的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在以往的论著中，曾将龙山时代出现的卜骨信仰的传播，称之为我国最早的一次信仰或思想革命。现在应指出的是，渭河乃是这一信仰或思想革命的策源地。

从以上所说可知，渭河流域孕育出来的半坡—西阴这支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主根；这支谱系的考古学文化于半坡四期文化时期成长起来的最初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满天星斗中的一颗亮星。这支谱系文化于西阴文化时期之后，分化为一些相互区别的子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中若干成员的族源。这支谱系文化对中国境内与其共时的其他诸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所产生的信仰、思想及文化影响的深广，与促进其发展的作用之巨大，于中国与其共时的诸谱系考古学文化中，无与伦比，即使将其置于与其同时的世界，也找不到可与之比肩的另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

（二）渭河流域诞生了新王国，也孕育出帝国文明，并将帝国文明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西安是西周王朝和西汉及唐皇朝的都城，和西安比邻的咸阳，是秦皇朝的国都。渭河流域是周、秦、西汉和唐四代的腹心地带。渭河流域孕育了周人和秦人，是周王国和秦帝国的发祥地；作为西汉和唐京城所在地区，也为这两代皇朝，尤其是为唐代将帝国文明推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发挥了当时中国其他地区远难以相比的作用。

其一，西周王朝将王国文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武王克商之年代，文献记载模糊，学者认识又存在巨大分歧，由此导致的西周的积年，难以确定，众说纷纭。依有的学者据古本《竹书纪年》以公元前1027年作为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之始年，到春秋之始公元前770年，西周王朝则存在257年。这是史家估定的西周最短的积年。西周王朝之时，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

文明和南欧克里特岛的爱琴文明已经衰落，同时雅利安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还尚未兴起，处在这两波文明之间，而和西周大致共时并立的当时世界的另一个强国，是位于西亚的第二亚述帝国。公元前1100年前后第二亚述帝国掌握了制铁技术，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称：第二亚述帝国凭借其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破城槌，称雄于西亚、北非。公元前612年，第二亚述帝国诸敌对者结成的联盟，摧毁了第二亚述帝国于公元前7世纪建立的首都尼尼微，从此便永远终结了亚述人的霸权。此时西周王朝虽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继承者春秋诸国却将西周文明延续下来，并创造出新的光辉。

殷墟之时，商王朝边境诸考古学文化族群发达起来，形成了对商王朝围堵之势。其中为考古学研究确认的先周时期周人的周文化，已掌握了商人的文字和制铜技术，成为了商王朝敌对者之盟主。周人的文王被尊为西伯。武王克商之后建立的周王朝，一是推进了青铜制造业的纵深发展，即不仅技术上有所进步，而且其封国均掌握了青铜制作技术。除此之外，于西周晚期又输进了制铁技术。二是将商人主要用于占卜的甲骨文，变为主要用于纪事铭功的金文，与文字演变的同时，掌握文字的人群和地区较商代广泛。这为“士”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先河。三是经过主要是周王朝境内诸考古学文化或族群的文化交流，至西周晚期，形成了各地略带特色、全周则基本相同的统一的文化，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以铜鼎和玉佩饰区分贵族等级的用鼎用玉的礼制，呈显出孔子所称赞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繁荣的文化格局。以这文化为基石，至东周演变为华夏族群认同的华夏文化。

西周社会的基础是“井”字，肢体是“亲亲”二字，核心是一“王”字。西周的封建制，摒弃了夏商王国推行的排他性的单一考古学文化族群国家的政治体制，采用包容多种考古学文化族群于一国之内进行治理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周王既分封本考古学文化族群的贵族，也分封与自身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族群的贵族，管理不同的众多封国。但对其存有戒心的非我考古学文化族群的贵族，实行或明或暗的监管，同时，也据封国内主体族群的区别，采行“因其俗，简其礼”“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等不同的措施和不同的治理制度，以实现“以藩屏周”。周王不仅分封不同考古学文化族群的贵族，管理其封国，且一些封国乃至王畿地区均容纳不同考古学文化族群的居民。历史文献作如是记载，至今考古学发现与研究也是呈显出这样的更为清晰的图景。

我曾经说过，中国国家形态经历过神王之国—王国—帝国，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党国阶段。龙山时代即尧舜时代，很可能已进入王国阶段，夏、商和西周无疑已处于王国历史范畴。这王国的历史演变，可分为龙山时代、夏商和西周三个阶段。龙山时代的诸同一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被分治于不同的王国，各个王国所能管理的仅为某一考古学文化的部分居民或族群；夏、商王国实行的是排他性的单一考古学文化族

群国家的政治体制，西周王国则实行政治上以一考古学文化族群为主，即以周族为主，同时容纳众多考古学文化族群于一国之内进行治理的政治体制。夏、商王国将同一考古学文化族群纳入同一政治体制之内进行管理，消除了龙山时代即尧舜时代将同一考古学文化族群分属多国管理而形成的政治壁垒，畅通了同一考古学文化族群的不同地域群体的经济、文化交往，有利于促进一体性经济和共同性文化的发展，增进了同一考古学文化族群的凝聚力。西周王国推行的容纳不同考古学文化族群于一国之内实施管理的政治体制，消除了夏、商王国实行的单一考古学文化族群国家所形成的族群之间的政治壁垒，在一国之内畅通了诸考古学文化族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同国的不同族群的融合开通了新的更为广阔的道路，也为将国外的考古学文化族群纳入王国内管理提供了广大的空间。可见，尧舜时期或龙山时代，夏、商王国和西周王国是不同质的王国，可分别称之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渭河流域孕育的周人创建的新王国，将王国文明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为后续的秦汉皇朝建立汉族为主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前奏。

其二，渭河流域孕育出了帝国文明，经历西汉和唐两个皇朝，又将帝国文明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秦、隋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短命的统一皇朝，西汉和唐这两大盛世的出现，和秦、隋这两个皇朝因果相缘，关系密切。西汉在秦开创的帝国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完善了帝国政治体制。唐继隋之后，将帝国前期的政治体制推进到了鼎盛时期。当秦帝国之世，与秦皇朝大体同时并立的是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使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国，当时世界的发达地区，自西而东并立着罗马、安息、贵霜和西汉这四大帝国，而能与西汉帝国匹对的仅是罗马帝国。到唐帝国盛时，版图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抵贝加尔湖。唐皇朝于扩容的非唐人族居住地区，或设都护府，或立羁縻州管辖，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其经济、文化和政治对东亚一些邻国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于东亚形成了唐文化圈。唐帝国之时，其西虽存在着阿拉伯和拜占庭这两大强国，且其势力向西推进被阿拉伯帝国阻于怛罗斯，但由于唐朝经济发达，推行兼容的文化政策，和将基于民本思想的宽松政治付之于实践，故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使中国站稳了亚洲的中国这一地位。

秦朝铁农具普及，农业生产开始向精耕细作发展，西汉广泛使用铸铁脱碳钢农具，奠定了中国精耕细作农业的基础，在废除井田制的基础上，五口之家的小农成为秦和西汉皇朝掌控下的“编户齐民”，和唐朝实行的均田制，使基于一家一户精耕细作的发达农业经济成为秦、西汉和唐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一社会经济基础上，手工业得到纵深发展：继秦仍用青铜制作部分兵器之后，汉唐将士则全以钢铁兵器纵横沙场；秦及西汉的漆器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上层人士生活中的诸多领域，并成为朝廷对外颁赐的重要物品；于陶瓷工艺领域，秦汉完善了建筑用陶生产，并在官府建筑中普及使

用了建筑用陶，唐代则在汉代发明的低温釉陶的基础上，创造了唐三彩，和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的成熟的瓷业生产；在丝织品生产领域，至秦代已几乎能生产出中国传统所有的丝织品种，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早期的丝绸衣服，显示出来的世界独领风骚的丝绸制作工艺，令人惊叹仰止，到了唐代，又将汉代的织、绣、印、染等丝绸制作工艺提升到了新的水平。除此之外，还有茶的种植和制茶工艺，以及造纸技术的发明与发展，等等，均标志着手工业经济自秦、经西汉至唐代繁荣的发展情景。这些手工业制品成为沟通中西经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的璀璨夺目的珍品，成为吸引各国使者和商人来中国的动力，中国成了当时世界经济交流的中心。

伴随着东周的社会变革，兴起了具有独立人格和自主思想的新士人阶层。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儒家、道家和墨家三个学派，至战国之时，形成以儒、法、道三家为主的百家争鸣的盛况，开创出中国人思想的新篇。这为中国人以往的思想演进画了个句号，又为中国人自此而后的思想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提供了原典。这是中国人思想的轴心时代。至佛教的传入，中国仍是无宗教而有思想信仰或具有浓厚发达的意识形态的国家。秦始皇崇法，汉武帝尊儒，掌握国家政权与军权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虽握有钦定主导国家主流思想的权利，却未掌握创制和发展思想的权柄。中国人的思想是由思想家创制，和由思想家注释、解读而得以发展。除如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以吏为师这样极端的思想专制的措施之外，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皇朝的各派思想家，都能较自由地为其主张的思想成为国家的主流或主导思想，进行竞逐，即使对已成为国家的主流或主导思想的解读，士人与士人之间，士人与臣子之间，臣子与臣子之间，乃至皇帝与臣子或士人之间也存在着相当自由的讨论空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帝国国家体制退出历史舞台之时。西汉晚期传入了佛教，东汉形成和发展出道教，从此，中国成为了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中国虽成为了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但包括唐代传入的宗教，除有的被某些民族笃信外，对于汉族来说，一是被社会上层溶解为思想学说，二是被社会下层化解于其敬天崇祖的多神信仰之中。溶解于社会上层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主流思想吸收了佛学，从而出现了以儒为主的儒、释、道的意识信仰系统，儒、释、道成为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这里的儒，基本上是儒表法里的儒。中国何时发展出以儒为主的儒、释、道的文化传统？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但我个人认为当不早过唐代，或许就是在唐代。至唐代，由于实行兼容的文化政策，吸纳了境外的精神和物质的，以及介于精神、物质之间的文化，伊斯兰教、袄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均已传入中国，同时，如李泽厚所言，佛教经历了许多变化后，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佛学禅宗，唐朝成为了世界文化交流与汇融中心，从而将中国文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秦始皇于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最为显赫的功绩：一是统一中国，二是创立帝国国家政治体制以管理这统一的中国。关于前者，就是他兼并了六国，修驰道、直道，形成

以咸阳为中心联结全国的快速交通网，和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及统一文字；关于后者，则是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以皇权为核心由文武官僚辅佐的中央集权专制的帝国国家政治体制。毛泽东承袭传统认识，说“百代皆行秦政制”。他讲的“秦政制”，指的就是这个帝国国家政治体制。这个帝国国家政治体制，是由秦始皇创立的，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将它推翻，代之以党国政治体制。汉承秦制，说来简单，其实不易，西汉前期，未能将秦建立的帝国国家政治体制直接继承下来，迂回曲折，搞了约80年的郡国双轨制，直到汉武帝时，秦推行的那套帝国国家政治体制才得以定型。并在这基础上，从制度上增添了这样两项内容：一是察举、征辟和考试等内容的选官制度，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属国都尉和持节领护。前者为贤能之士进入官僚体制辟出了渠道，激活了官僚体制的源头，后者使西周开始实行的一国多制成为定制，为将文化与社会结构不同的族群纳入统一国家管理拓宽了道路。唐代推行的科举制度和羁縻州制，完善了上述西汉实行的两项制度性措施，同时较之秦汉实施的考核与纠察官吏的措施，唐代健全了官吏的铨选、考课、封爵、勋赏、监察和弹劾制度，为集权制度下的官僚体制的健康运转实增添了活力，在唐太宗践行民本政治的推动下，便出现了史称的“贞观之治”，使帝国国家政治体制正能量的发挥于唐代已达到空前未见的极致。

这一帝国国家政治体制，较之西周推行的王国国家政治体制，展现出了历史的巨大进步，这进步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除皇帝为世袭传承之外，凡官僚均不能世袭，不论出身，凡贤能者均可通过察举或科举，进入官僚群体，参与管理国家，从而扩大了参与治理国家的人群；二是从中央到地方政权机构的设置及其运行机制，配以官吏的铨选、考课、监察及弹劾等制度，便畅通了国家与社会以及地方与中央的自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政治渠道，使国家和社会的联系更加广泛，结果是国家更贴近社会，从而扩大和夯实了国家即政权管理统治的社会基础；三是推行的属国都尉、持节领护和羁縻州制，使一国多制成为定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一国多制。这“一国多制”制度中的“多制”，为将文化与社会结构不同的族群纳入统一的国家管理开通了广阔的道路，这“一国多制”制度中的“一国”，为不同族群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乃至融合与发展，提供了更为顺畅的条件。正是由于西汉使一国多制成为定制，唐代发展了一国多制，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才奠基于西汉，发展于唐代，并制约着往后的发展只能沿着这汉唐形成的道路继续向前。寻根溯源，一国多制才是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所以成为中国的历史特色，沉淀为中国的基本国情的主要原因。有了这三个方面的进步，我国自秦汉起便能以皇权为核心，由文武官僚辅佐的中央集权专制的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正是这一帝国国家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才出现汉、唐的经济、文化的辉煌，使汉、唐处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成为当时世界的强国。

说到这里，我想渭河流域在中国文化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这一问题，和周、秦、西汉和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价值的问题，以及周、秦、西汉和唐在其同时的世界人文环境中的地位与价值问题或许是大致讲清楚了。从以上讲的可以知道：渭河流域孕育出来的半坡—西阴文化这支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在当时中华大地上的诸谱系的考古学文化中，是一支强盛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主根；渭河流域发育出来的最初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满天星斗中的一颗亮星；渭河流域诞生的周人建立的西周王国，革新了夏、商王国建立的政治体制，将王国文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渭河流域生长出来的秦人，使中国走出了王国文明，破天荒地创建了管理统一国家的帝国国家政治体制，建都长安的西汉和唐皇朝，推进了帝国国家政治体制的建设，自秦汉始，中国就以皇权为核心、由文武官僚辅佐的中央集权专制的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成就出汉唐盛世，且在唐太宗践行民本政治的推动下，空前极致地发挥出帝国国家政治体制的正能量，使唐成为了当时世界的先进国家。西汉是与罗马并立的强国，唐则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心，成为了当时世界的超强国家。西汉和唐为使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国的历史特色，沉淀成中国的基本国情，奠定了深厚根基，建成了基本框架。中国内陆存在珠江、长江、黄河、西拉木伦河—辽河和松花江及黑龙江诸大水系，这些大河水系又由众多的支流构成。这些大河及其支流均为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孕育、形成及发展做出了贡献。从上述可知，为中国或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孕育、形成与发展做出最大、最重要贡献者，乃是渭河流域，可以说，渭河乃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第一母亲河。

附记：我2013年10月2日开始写这个发言稿之时，除自己起草之外，邀滕铭予写了一稿和这一稿本的修改稿。这两稿内容，均为周秦汉唐，用以参考。在西安发言之前，我将准备的发言稿作了修改。发言是按这个修改稿讲的。自西安回到北京后，时改、时停了两三次，将那个发言稿改来改去改了二、三次。在这些修改过程中，又邀滕铭予为我改写这个稿子提供了内容涉及秦、西汉、唐的稿本，参考了她提出的一些认识，最终于2014年5月28日下午4时40分才改成这个稿子。写作这稿子的过程中，使我深感学力之不济，经苦苦挣扎，才搞出这样一个自己也不太满意的稿子，所以交出去付印，只是深感该为中国考古学会站好最后一班岗而已。

目 录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暨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词（代序）·····	张忠培（1）
沅西西周遗址范围及地下遗存分布状况新认识·····	徐良高 付仲杨 宋江宁（1）
周原甲骨文占卜内容的分项整理与研究·····	王建军 赵海洲（22）
考古所见西周王朝南土的封国·····	曹 斌（43）
论西周王朝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略·····	赵东升（62）
从应国墓地发掘看应侯视工墓的年代	
——兼谈“舍其上下而取其中间”的墓葬断代原则·····	王 正 孙清远（72）
河南周代诸侯陵墓考古揭示的几个问题·····	马俊才（95）
郑韩地区东周墓出土仿铜陶礼器研究·····	樊温泉 尹以江（111）
由青铜簋盛器论楚国的礼制变革·····	张闻捷（127）
吴越双铎铭文小考·····	曹锦炎（142）
故秦地置郡考·····	凡国栋（149）
辽东地区战国（燕）、秦、西汉早期长城调查与研究	
·····	陈 山 吴炎亮 刘 明（161）
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建筑形式的新认识·····	申茂盛（169）
正藏与外藏·····	王学理（178）
汉代灯具的明器功能及其内涵·····	麻赛萍（189）
西安地区汉墓出土葬玉浅析·····	张翔宇 韩文生（198）
辽东地区汉长城调查与初步研究·····	刘 明 吴炎亮 陈 山（208）
两汉时期辽东郡沿海经济带的形成·····	张翠敏（218）
江西汉代墓葬特征研究·····	刘慧中（229）
汉墓中的仙境模拟与升仙	
——主要以四川（含重庆）地区汉墓为例·····	索德浩（240）
沈阳上伯官屯城址与汉代玄菟郡的二迁·····	付永平（253）

候城县新考	姜万里 (264)
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张建林 田有前 (273)
浅析朝阳唐墓出土的俑	郭 明 (300)
关中地区旧石器时代动物遗存研究	赵 晨 贾 尧 (310)
鄂皖苏沿江文化带与聚落群的几点思考	甘大明 仲召兵 (325)
东龙山文化墓葬分期研究	张童心 王效玮 (336)
藏礼于器	
——大河口西周墓地随葬容器内存积土研究的新思路	
..... 赵春燕 赵志军 谢尧亭 宋建忠	(347)
论风神、雷神图像艺术的发展谱系	王元林 (351)
公元4~5世纪乐浪、带方二郡故地与中国江南地区的关系	
——从平壤新出土的青瓷狮形器谈起	赵俊杰 (362)
河南新安西晋墓 C12M262 帷帐的复原	魏曙光 (371)
试论辽代汉族墓葬的棺尸床	林 栋 (379)

沔西西周遗址范围及地下遗存 分布状况新认识

徐良高 付仲杨 宋江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 缘 起

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作为西周都城的丰镐遗址考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初步划定丰镐遗址的范围和保护区域，确定其年代与性质。
2. 建立了西周考古的陶器分期断代标尺。
3. 确定了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的划分标准。
4. 发现了包括大型建筑基址与宫殿区、铸铜、骨器制造、陶器制造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以井叔家族墓地为代表的大片墓地、多处青铜器窖藏等在内的一大批西周遗存，为全面掌握丰镐遗址的地下遗存分布状况提供了一定的材料。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等原因，也存在诸多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丰镐遗址的边界不够科学精确。丰镐遗址的边界范围经过几次调整，但都不够科学准确，未经过专门的考古勘探，缺乏准确的科学依据，也不能满足科学规划的需要。

2. 未将丰镐遗址的沔东、沔西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展工作，进行研究。这与历史上丰镐遗址作为整体发挥西周都城作用的实际情况不符。将沔东、沔西分别对待还导致对作为遗址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丰镐遗址发挥联结作用的水系的忽视。

3. 对丰镐遗址的古环境、古地貌、古水系关注甚少，研究不够清楚。从种种迹象看，丰镐一带有多条河流和特定地形地貌对遗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具体情况及其与遗址分布的关系尚缺少专门研究。

4. 过去工作多着眼于具体单个遗存时代、性质的研究，未将丰镐遗址作为一个聚落整体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探索丰镐遗址的整体聚落布局。

5. 过去工作多着眼于墓葬和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一般居址、灰坑、作